

《周颂·有瞽》与周代观乐制度

姚小鸥 李文慧

《周颂·有瞽》篇所描述的“大合乐”集先秦礼乐之大成。据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等先秦经籍，这一礼典远非“合诸乐器”的解释所能涵盖，而是集合华夏主流文化和周边部族文化的丰富内涵。通过探索大合乐的重要内容——《大武》之乐内涵的演变，可知大合乐着重体现周代礼乐文化中“乐”的“和同”功能。《有瞽》篇所描述的观乐仪节是展现乐的这一独特功能的重要方式，它反映周人礼乐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历史渊源与演变。学术界一般认为《颂》诗的性质是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，由《有瞽》篇之讨论，可见《颂》诗中还有包含关于礼乐制度运行的其他内容。

在《周颂》中，《有瞽》篇的意义似较为显豁，而实蕴含着先秦礼乐文化的深刻内容。该篇所描述的大合乐是与周代祭礼、宾礼相关的重要礼典，反映了周代集大成的礼乐思想。《诗序》：“《有瞽》，始作乐而合乎祖也。”郑笺：“王者治定制礼，功成作乐。合者，大合诸乐而奏之。”^①大合乐是祭祀先祖仪式的一部分，也是王室以宾礼接见诸侯的重要仪节。所谓“大合乐”，孔疏认为：“大合诸乐而奏之，谓合诸乐器一时奏之，即经所云‘鞀磬祝圉’、‘箫管’之属是也。”^②然细考可知，孔疏以“合诸乐器”释“大合乐”，实未尽其义。

从技术层面来看，大合乐集合了应、田、悬鼓、鞀、磬、祝、圉、箫、管等多种乐器。这些乐器是礼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，属于古人所谓之“礼器”。诸器齐备乃大合乐的前提，然尚不能充分表达其内涵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乐者，非谓黄钟、大吕、弦歌、干扬也，乐之末节也。”^③前述孔疏仅瞩目于诗篇中所陈述的“乐之末节”，不免流于片面。“合乐”是先秦时期礼乐盛典中所演出的综合形态的艺术。傅道彬指出，它包含了堂上歌诗、堂下吹笙、众声俱作等几个方面^④；同时，往往还包括相关的舞容。“大合乐”是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合乐更为盛大的礼乐活动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：“以六律、六同、五声、八音、六舞，大合乐，以致鬼神示，以和邦国，以谐万民，以安宾客，以说远人，以作动物。”郑注：“大合乐者，谓遍作六代之乐，以冬至至作之，致天神人鬼，以夏日至作之，致地祇物彪。”^⑤据上引《周礼》经传，大合乐含“六代之乐”^⑥，用于祭礼、宾礼等

多种重要礼典。

先秦时期,王室皆集数代之乐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记载,《九招》、《六列》、《六英》作于帝舜时期。帝舜时,质修此三乐,“以明帝德”。至殷汤时,“伊尹作为《大护》,歌《晨露》,修《九招》、《六列》,以见其善”^⑦。《墨子·三辩》云:“汤放桀于大水,环天下自立以为王,事成功立,无大后患,因先王之乐,又自作乐,命曰《护》,又修《九招》。”^⑧上述情况表明,殷商王室在保存先代之乐的同时,对其有所增订和修饰。

周王室依惯例存先代之乐。这些乐章保存了前代的礼乐文化成果,被周人借鉴和吸收,逐渐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礼的实际运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周王室所存六代之乐主要用于祭祀,祭祀内容各有不同:“乃分乐而序之,以祭,以享,以祀。乃奏黄钟,歌大吕,舞《云门》,以祀天神。乃奏大簇,歌应钟,舞《咸池》,以祭地示。乃奏姑洗,歌南吕,舞《大磬》,以祀四望。乃奏蕤宾,歌函钟,舞《大夏》,以祭山川。乃奏夷则,歌小吕,舞《大濩》,以享先妣。乃奏无射,歌夹钟,舞《大武》,以享先祖。”^⑨王室祭祀往往诸乐并用。因周公的特殊功绩,周王室特许鲁人享有天子礼乐,故鲁人所存之礼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周王室用乐的情况^⑩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载鲁人以禘礼祀周公:“升歌《清庙》,下管《象》,朱干玉戚,冕而舞《大武》。皮弁素积,裼而舞《大夏》。《昧》,东夷之乐也。《任》,南蛮之乐也。纳夷蛮之乐于大庙,言广鲁于天下也。”^⑪上述合乐,除《大武》、《大夏》等华夏之乐外,尚有《昧》、《任》等夷蛮之乐。由此可知,大合乐的内容集合了中原地区华夏主流文化及周边诸族文化,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《诗序》认为,《有瞽》篇之“大合乐”是在“始作乐”的前提下进行的。先秦时期,“作乐”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。它的所指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创制新乐,而往往包含对整个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。《礼记·乐记》说:“王者功成作乐,治定制礼,其功大者其乐备,其治辩者其礼具。”^⑫这里所说的“制礼作乐”与周公相关。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表明,在历史上,人们往往将周公与制礼作乐相联系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载,周公摄政六年,“朝诸侯于明堂,制礼作乐,颁度量,而天下大服”^⑬。“制礼作乐”与“颁度量”相联系,其意在确立规范天下的制度体系和思想观念。

《大武》是周代王者之乐,故孔颖达以为“始作乐”乃“始作《大武》之乐”^⑭。据前文所引郑笺“大合诸乐”之说,笔者认为孔氏以《大武》概指“始作乐”之“乐”,有以偏概全之嫌。就《大武》而言,根据周人“制礼作乐”的历史意义与《大武》之乐的发展演变来看,《有瞽》篇之“大合乐”反映了周代中期以后的礼乐思想。对《有瞽》一篇的讨论,应建立在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。

在周人礼乐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,《大武》之乐有一个不断充实和演变的过程。根据《逸周书》的有关记载,《大武》的部分内容在克商后五十天内已经创作出来了。《逸周书·世俘》:“惟一月丙辰旁生魄……王乃步自于周,征伐商王纣……越五日甲子朝,至,接于商……甲寅,谒伐殷于牧野。王佩赤白旂。籥人奏《武》。”^⑮李学勤指出:“《武》的演奏,可能即以此为初次。”^⑯古人多认为《大武》创作于周公摄政六年“制礼作乐”之时。《酌》系《大武》之一章,为学术界所公认。《酌》之《诗序》云:“告成《大武》也。”郑笺解释说:“周公居摄六年,制礼作乐,归政成王,乃后祭于庙而奏之。其始成告之而已。”^⑰

按:上述两种说法并不相矛盾。根据相关记载可推知,《大武》的创作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。《礼记·乐记》记载孔子与宾牟贾论乐时,对《大武》的内容作了被广为称引的经典描述。孔子说:“夫《武》,始而北出,再成而灭商,三成而南,四成而南国是疆,五成而分周公左、召公右,六成复缀,以崇天子。”^⑱孔子的上述描述显示出,春秋时期人们所认识的《大武》乐,除了

武王克商外,还有南国是疆、周、召分治等内容。其中,“南国是疆”是一个历时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¹⁹。

周人疆理南国在克商不久即已开始。《史墙盘》叙述昭王功绩:“弘(宏)鲁邵(昭)王,广黻(惩)楚荆,唯奭(焕)南行。”²⁰可见,昭王时,南国仍是周王朝着力经营的对象。有学者认为,至周宣王时,汉北、淮西等“南土”才正式疆理为周王朝统治范围²¹。《大雅·崧高》、《江汉》诸篇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过描述。

由《大武》文本及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描述,可知《大武》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,从中可看出周初及以后一段时期内的礼乐建设中,人们对该乐不断增订、修饰的痕迹。周初《大武》的首要内容是颂扬武功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郑注云:“《大武》,武王乐也。武王伐纣以除其害,言其德能成武功。”²²武王克商,大肆杀伐,流血漂杵之事载于史书。《逸周书·世俘》记载克商之役及连带征伐杀戮俘掠,斩杀“亿有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”,“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”²³。据前引《逸周书》可看出《周颂·武》是《大武》之乐中创作较早的一篇。《武》篇有“胜殷遏刘”一句,马瑞辰指出,“遏、刘”二字皆是“灭杀”意,此句“谓胜殷而灭杀之,犹《周语》云‘蔑杀其民人’也”²⁴。《大武》杀伐之气浓重,故孔子对其颇有微词,认为其“尽美矣,未尽善也”²⁵。

随着克商大业的完成,周人的统治进入了敬守天下的历史阶段,《大武》所宣示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记载,楚人战胜了晋人,楚臣潘党根据“克敌,必示子孙,以无忘武功”的传统,提出“收晋尸以为京观”。楚庄王否定了这一提议,其理由是:“夫文,止戈为武……夫武,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。”杜注云:“此武七德。”²⁶潘党与楚庄王对“武”这一观念的不同表达,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《大武》的不同理解,也反映出春秋时期,人们所见之《大武》已明确地具有了“安民”、“和众”等内容。

《大武》思想倾向的改变使其在西周中期以后各种礼典场合得以有效运用。作为“王者功成作乐”的代表,《大武》宣扬武功的内容决定了其气势的庄严雄壮而不可亵渎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:“《武》壮,而不可乐也。”孔颖达正义:“《武》是万舞,大武也,以示壮勇之容,不可常为娱乐。”²⁷周代中后期,这种情况在礼乐的实际运用中已经有所改变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,吴公子季札观乐时,《大武》即为其所观乐舞之一。

上述内容反映出,春秋时期人们所见《大武》反映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政治与历史体系,在它的实际运用过程中,人们更注重其观赏效果,即乐的“和同”功能。由《大武》内涵的历史演变与先秦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,反观《有瞽》一篇,大合乐的效果是“嚶嚶厥声,肃雍和鸣”,显示出乐之“敬”、“和”的功能,这与周代中期以后人们对《大武》的理解是相符合的²⁸。在周代政治体系中,乐的主要功能是“和同”。《礼记·乐记》:“乐在宗庙之中,君臣上下同听之,则莫不和敬;在族长乡里之中,长幼同听之,则莫不和顺;在闺门之内,父子兄弟同听之,则莫不和亲。故乐者,审一以定和,比物以饰节,节奏合以成文,所以合和父子君臣,附亲万民也。”²⁹《乐记》的上述言论反映出,乐的独特功能通过一定的仪节而展现。《有瞽》篇所涉及的观乐仪节即为其例。

王室祭祀合乐之时,诸侯助祭、观乐是历代的惯例。《尚书·益稷》载帝舜时期合乐时:“(夔)夔击鸣球,搏拊琴瑟以咏。祖考来格。虞宾在位,群后德让。下管鼗鼓,合止祝敌,笙镛以间,鸟兽跄跄。箫韶九成,凤皇来仪。”³⁰

《诗经》中,与上述《益稷》的有关内容,甚至与《有瞽》全篇相类的是《商颂·那》。《那》描写殷人祭祀成汤时,商朝的先代即虞夏二代的后裔助祭并观乐的情景:“猗与那与,置我鞀鼓。奏鼓简简,衎我烈祖。汤孙奏假,绥我思成。鞀鼓渊渊,嘒嘒管声。既和且平,依我磬声。於赫汤

孙 穆穆厥声。庸鼓有敦,万舞有奕。我有嘉客,亦不夷怍。自古在昔,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,执事有恪,顾予烝尝,汤孙之将。”结合上述《尚书·益稷》、《商颂·那》篇的相关内容可看出,观乐绝非仅仅为参与者提供一般意义上的感官享受,而是为了通过这种仪式发挥乐的“和同”功能。作为“观”的重要内容,乐的“和同”功能主要表现在谐和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关系,即《舜典》所谓“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”^①。

乐是沟通天人之际的独特方式。在先秦人们的思维中,乐是在万物流而不息、合同而化的自然状态下应运而兴。《礼记·乐记》:“地气上齐,天气下降,阴阳相摩,天地相荡,鼓之以雷霆,奋之以风雨,动之以四时,暖之以日月,而百化兴焉。如此,则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”^②乐的这种自然属性使它能够引起受众的共鸣与深思,进而使礼的精神深入人心。所以《乐记》说:“乐也者,圣人之所乐也,而可以善民心。其感人深,其移风易俗,故先王著其教焉。”^③人们感于乐之伦理教化,守礼慎行,则天下可得而治。《乐记》:“乐行而伦清,耳目聪明,血气和平,移风易俗,天下皆宁。”^④《有瞽》篇之“我客戾止,永观厥成”与《那》篇之“我有嘉客,亦不夷怍”从“客”的角度描写了乐的“和同”功能所达到的良好效果,从而突出了观乐仪节在整个祭礼、宾礼中的特殊作用。

先秦时期,王者根据灭国不绝祀的原则,对先代后裔给予宽厚的待遇,尊其为“客”,并允其保有先代之礼乐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:“天子存二代之后,犹尊贤也。尊贤不过二代。”^⑤周人所谓的“二代之后”是指夏、商后裔杞、宋两国国君^⑥。王室在举行重大祀典时,四方诸侯依惯例皆来朝助祭。为“客”诸侯地位尊贵,王室以最高规格——大合乐作为此次祭礼和宾礼程序的一部分,故《有瞽》篇特言“客”往观乐成^⑦。

观乐以其慎重的形式显示出王室对宾客的重视,另一方面,意味着要求“客”及其他观乐诸侯在德行上要具备与之身份相符的君子风范,从而达到纲纪天下的目的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:“夫乐以安德,义以处之,礼以行之,信以守之,仁以厉之。而后可以殿邦国,同福禄,来远人,所谓乐也。”^⑧《周易》“观”卦六四爻辞说:“观国之光,利用宾于王。”^⑨爻辞反映出周代社会对于王室宾礼观乐功能的共识。在周代,周天子为天下大宗,王室之礼乐为天下诸侯效法。周代中期以后,观乐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乐制度,在诸侯邦交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的季札观乐,即为其著例。为充分发挥乐之“和同”的功用,周人建立并逐渐发展完善了礼乐制度,观乐与赐乐及各种礼典用乐等共同构成了周代用乐规范。

综上所述,作为礼乐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,乐通过“治心”使人从根本上提升伦理道德修养,进而达到天下大同。《乐记》:“致乐以治心,则易、直、子、谅之心油然而生矣。易、直、子、谅之心生则乐,乐则安,安则久,久则天,天则神。天则不言而信,神则不怒而威,致乐以治心者也。”^⑩礼则更注重揖让周旋的仪节。《乐记》:“致礼以治躬则庄敬,庄敬则严威。”^⑪礼、乐二者之间是一种浑言则同、析言则异、互有区别又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。即如《乐记》所言:“乐者为同,礼者为异,同则相亲,异则相敬。”^⑫

从狭义的角度来看,乐乃礼之文。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载孔子言:“不能《诗》,于礼缪;不能乐,于礼素。”郑注云:“缪,误也。素,犹质也。歌《诗》,所以通礼意也。作乐,所以同成礼文也。”^⑬大合乐给以“礼乐征伐”为内涵的周礼赋予了一个庄重而亲和的形式。《有瞽》篇所描述的这一礼典上承虞舜、殷商时期诸侯助祭并观乐的传统,下启春秋宾礼中的观乐仪式,在周代礼乐制度中,具有极重要的经典意义。

①②④⑦ 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594页,第594页,第595页,第

604页。

- ③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 郑玄注、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538页,第1489页,第1530页,第1488页,第1542页,第1455页,第1545页,第1531页,第1534页,第1536页,第1448页,第1543页,第1544页,第1529页,第1614页。
- ④ 傅道彬《诗可以观——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》,中华书局2010年版,第72—73页。
- ⑤⑨㉔ 郑玄注、贾公彦疏《周礼注疏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788页,第788—789页,第787页。
- ⑥ 据《周礼·大司乐》,“六代之乐”指《云门》、《大卷》、《大咸》、《大磬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。
- ⑦ 陈奇猷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288—289页。
- ⑧ 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《孙诒让全集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40页。
- ⑩ 《礼记·明堂位》:“凡四代之服、器、官,鲁兼用之。是故鲁,王礼也,天下传之久矣,君臣未尝相弑也。礼乐、刑法、政俗,未尝相变也。天下以为有道之国,是故天下资礼乐焉。”(《礼记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492页。)
- ⑮㉓ 黄怀信等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412—428页,第435页。引文中“谒伐殷”的“伐”原误为“我”,卢文弨校改为“戎”。李学勤认为“我”应校正为“伐”,“谒”训为“告”。今从李说(参见李学勤《〈世俘〉篇研究》,载《史学月刊》1988年第2期)。
- ⑮ 李学勤《〈世俘〉篇研究》,载《史学月刊》1988年第2期。
- ⑰ “南国”是周代一个特有的地理概念。郭人民指出,南国的地理方位是:“北起终南山、熊耳山、嵩山,南达长江北岸,东南至淮、汝,西南至巴山以东的鄂北,包括今陕南、豫南、鄂北之地,正在岐丰洛阳之南,所谓江、沔、汝、汉地区。”(参见郭人民《文王化行南国与周人经营江汉》,载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80年第2期。)
- ㉔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6.10175。“𡗗(𡗗)”字,参见李学勤《通向文明之路》,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,第177页。
- ㉔ 李学勤在《文王与周宣王中兴》、《论西周的南国湘侯》等文中考证有关金文内容指出,昭王时,周人势力已经进入湖南北部。宣王二十三年,南方业已稳定。此可为郭人民有关周人疆理南国范围等相关研究的补充(参见李学勤《通向文明之路》,第150—179页)。
- ㉔ 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1089页。
- ㉔ 《论语·八佾》,何晏注、邢昺疏《论语注疏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2469页。
- ㉔㉔ 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882页,第1951页。
- ㉔ 《礼记·乐记》:“《诗》云‘肃雍和鸣,先祖是听。’夫肃肃,敬也。雍雍,和也。夫敬以和,何事不行?”(《礼记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541页。)
- ㉔㉔ 孔安国传、孔颖达疏《尚书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44页,第131页。
- ㉔ 《有瞽》之“客”,郑笺:“我客,二王之后也。”《商颂·那》中的二王之后指虞、夏二代,而周所谓二王之后指夏、商二代(参见姚小鸥、李文慧《〈周颂·有客〉与周代宾礼》,载《学术研究》2011年第6期)。
- ㉔ 大合乐作为观乐仪式的典型,是周代历年举行的重大礼典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大合乐在每年的季春举行,“天子乃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,亲往视之”(《礼记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364页)。
- ㉔ 王弼、韩康伯注、孔颖达疏《周易正义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36页。

(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)

责任编辑 山木